

戈巴契夫執政後的蘇聯

尹慶耀

引言

一九八七年春，鄧小平曾對黨內指示，中共的改革，不應落於蘇聯之後。^①將中共與蘇聯作一次比較並不容易。鄧小平曾稱中共當前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②戈巴契夫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在伯力演說時，對蘇聯的改革，也用第二次革命來形容。二者的改革之間，雖有若干「大同」，但也有不少「小異」，而且那可能很重要。

中共改革的核心，是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很難意味到它包括政治和一般社會文化的現代化在內。蘇聯則是經濟改革、政治民主化、資訊公開……，總之，是從經濟體制到社會心理，各方面都求其充滿活力。當然，那些都要以共黨的觀念去理解，不能以自由世界的尺度去衡量。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初，鄧小平對義大利總理貝蒂諾·克拉克西說，經濟體制改革走到一定的時候，就必定要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比經濟體制改革要複雜得多，我們還未理出頭緒來。^③事實上，中共現有的政治體制就是四化的一大障礙，為形勢所迫，才不得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並於一九八六年從事探索。誰知一探索就探索出毛病，又掀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來予以收縮。儘管中共領導者羣不斷聲明政策不變，但它那業已開啓的天窗正逐漸掩閉，或至少有人想掩閉。蘇聯對於中共的經濟體制改革，最初抱持否定的態度，一九八五年八月七日消息報，指摘中共引進市場經濟、非中央集權化、放鬆計劃經濟，是造成經濟困難的最大原因，背離了社會主義體制。^④而今蘇聯改革的速度和幅度，使得東歐各國感到困惑，中共也擔心落

註① 源出一九八七年三月號鏡報（香港），轉自日本：讀賣新聞，同月十一日，第五面。

註② 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鄧小平對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講，文滙報（香港），同月十日，第一版。

註③ 文滙報（香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日，第一版。

註④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五年八月九日，第六面。

後。蘇聯關閉著的天窗，正逐漸開啓。

那麼，戈巴契夫的蘇聯，業已走上新生道路，他的改革一定會成功嗎？那可未必。以下，我們且就戈巴契夫統治下的蘇聯，特別是有關改革的種種問題，作一些探索性的研討。

一

布里茲涅夫晚年，蘇聯幹部老化、社會僵化，很難有改革可言。他以後的兩任總書記兼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安德洛波夫（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就任，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死亡）和契爾年科（一九八四年二月就任，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死亡），也因年老多病，在任期短，勢難有所作為。蘇聯人已不願再看到老年領導者走馬燈式的更迭，於是五十四歲（一九八五年三月）的戈巴契夫（現年五十六歲），才能很容易地壓倒黨中央若干元老級人物而當選總書記。

布里茲涅夫晚年，蘇聯經濟也一蹶不振，成長率逐漸接近到零。另一方面，七〇年代末起，西方先進國家的高科技產業突飛猛晉，蘇聯被遠遠拋在背後，不從事變革，它將在和平競賽中被振出局。戈巴契夫在政治局兼中央書記任內，主管過農業、輕工業而又力主改革，於是也就順理成章地接了棒。然而這並不是說，蘇共內部已經沒有權力鬭爭。

戈巴契夫出任總書記是由葛羅米柯提名的，有消息說當時在政治局投票，戈巴契夫和另一位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委會第一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格里辛（V. V. Grishin 一九一四年生）同票，最後由主席葛羅米柯的一票決了勝負。⑤

前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省黨委會第一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羅曼諾夫（G. V. Romanov 一九二三年生），是比較年輕，足與戈巴契夫對抗的人物。而列寧格勒省是蘇聯的國防工業區，因此羅曼諾夫與前國防部長烏斯蒂諾夫（D. F. Ustinov）關係較好，烏斯蒂諾夫死後，他就失去有力的支持。後來他訪問芬蘭時酗酒出醜，有損他的政治形象，一九八五年七月，他就下臺離職。

戈巴契夫不兼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元首），而將這個寶座讓給葛羅米柯，可視為報答他的提拔之恩，但也等於把這位長老實際上架空。從一九八〇年就出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的吉洪諾夫（N. A. Tikhonov 一九〇五年生），於一九八五年退休，由雷日科夫（N. I. Ryzhkov）繼任。同年十二月廿四日，格里辛被解除莫斯科市委會第一書記職務，由葉爾岑（B. N. Yeltsin）繼任。

註⑤ 讀實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第五面。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政治局委員、哈薩克共和國黨委會第一書記庫納耶夫(D. A. Kunayev)一九一二年生，時年七十四歲)被解除哈薩克中央第一書記職務。他是布里茲涅夫的親密助手，曾任政治局委員十五年，哈薩克黨委會第一書記廿二年，且一度被目為布里茲涅夫的接班人之一。他的解職曾引起哈薩克首府阿拉木圖的暴動，有警察七人死亡，羣衆約二十人負傷。原因是蘇共有一項不成文法，少數民族國家的黨委第一書記必然是當地人，第二書記可以是其他民族的人。這次撤換庫納耶夫，却以西伯利亞出身的俄羅斯人科爾賓(G. Kolbin)一九二七年生)繼任，招致學生及地方人士的反對。當然，其中也含有一般人對生活不滿而借題發揮的意義。同月廿一日，在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索洛敏澤夫(M. S. Solomentsev)一九一三年生)主持下，召開哈薩克共和國緊急內閣會議，決定增加消費物資的供應，改善商業及服務業品質，對地方幹部則嚴加批評。阿拉木圖暴動前後，哈薩克有黨幹部十四人被免職。庫納耶夫丟掉了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位。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四日，哈薩克共黨在科爾賓主持下召開中央會議，追究庫納耶夫任內領導階層的貪污腐敗的責任，庫納耶夫被驅逐出黨。

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烏克蘭黨委會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V. V. Shcherbivsky)一九一八年生)，也是布里茲涅夫系的人物，據一九八七年三月廿八日的眞理報報導，謝爾比茨基在同月廿四日開始的烏克蘭黨中央全會中受到批評，被指為使得烏克蘭建設事業停滯、醫療制度缺點衆多、獨立核算制遲遲不能實現。不過，全會開幕時仍由謝演說，短期內或許不致步上庫納耶夫の後塵。⑥但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老人，除葛羅米柯外，政治局委員中只有謝爾比茨基一人了。

平心而論，戈巴契夫大幅更換幹部，不能完全視為整肅異己。他整治貪污、整飭紀綱、重振勞動紀律，目的也在健全黨政組織，恢復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與權威，並提高經濟效益。他起用新人，其標準大致是：年輕化、技術化、效率化。他的整頓是大刀濶斧的。據一項統計顯示，自從戈巴契夫上臺以來，黨中央部長級幹部二人，更迭了百分之七〇。地方、州第一書記一五七人，更迭了百分之四五。政府部長級一〇五人，更迭了百分之七〇。駐外大使一三七人，更迭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在蘇共中央，戈巴契夫上臺後的新面孔，計(總書記除外)政治局委員一〇人中有五人，候補委員八人中有六人，書記十一人中有八人。⑦另據蘇聯人民監察委員會主席什科爾尼科夫(A. M. Shkolnikov)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報告稱，在過去一年間，蘇聯經濟官僚約一萬三千人因濫用職權被撤換。同一期間有十萬個經營者被發覺有偽造文書及冒領公款等公然違法犯紀的行爲。⑧

註⑥ 轉自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第七面。

註⑦ 「戈巴契夫的改革」(下)，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一日，第七面。

註⑧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日，第七面。

戈巴契夫政權前兩年似乎着意在整理黨政機構並鞏固自己的地位，當然這也是他從事改革所必需的步驟。

二

戈巴契夫是改革派，如前所述，他的改革幅度很大，包括政治民主化、資訊公開及經濟改革等等。但是，蘇聯在理論上常常講「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在經濟上常常說是「完善」、「重組」、「補充」社會主義制度，而避免用「改革」字樣。然而，自由世界還是用「改革」二字來作報導與評論。事實上，戈巴契夫現用的却是「改造」字樣、

在一九八七年一月蘇共中央全會中，戈巴契夫作了關於改革和幹部政策的報告，並用很大篇幅，「客觀地批判地分析社會現狀」。他說，在蘇聯發展的「某個階段（即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交替時期），國家開始失去了前進的速度，困難和問題越積越多，出現了停滯和其他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現象」。他用「危機」這個很重的字眼來形容這種狀況，稱「社會中危機現象滋生」。

基於上述認識，戈巴契夫執政兩年來，於一九八五年四月全會提出「加速戰略」，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七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一九八七年一月全會提出一個激進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⑩。目的就在改變蘇聯社會僵化、停滯的狀態。

經濟體制是改革的重點乃至核心，這由一九八七年一月蘇共中央全會任命政治局候補委員斯留尼可夫(N. N. Slyun'kov)這樣一個高級人物為黨中央經濟部長，即可察知一二。

如前所述，一九七九至八二年，蘇聯經濟成長率低降接近到零。農業係共黨國家之癌，蘇聯尤其如此。一九八一至八五年即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糧產計劃指標為年平均二億三、九〇〇萬噸，實際僅約一億八、三〇〇萬噸。每年須由國外進口穀物，一九八五年為五、五〇〇萬噸，那需要不少外匯。

蘇聯經濟發展路線，係以重工業優先，可是近年來石油、煤炭、鋼鐵、水泥……都在減產。特別是石油一項，從一九八二年起即不能達成生產目標。一九八三年產油六億一、六三〇萬噸，一九八四年六億一、三〇〇萬噸，是歷史上第一次絕對產量降低。一九八五年更降至五億九、五〇〇萬噸（一九八六年六億一、五〇〇萬噸，仍較生產目標略低）。石油輸出為蘇聯獲取外匯的最大來源。依西方估計，一九八三年蘇聯輸出石油獲得二三〇億美元，佔其全部外匯收入的百分之八〇。然而，產油量降低再加上石油跌價，對蘇聯經濟的打擊，是相當嚴重的。以致蘇聯不得不拋售黃金來彌補赤字。

註⑩ 于盧，「蘇聯改革的新發展」（上），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一日，第三版。

註⑪ 同註⑩。

一九八五年二月，當時任蘇聯外長的葛羅米柯訪問義大利，與義協議從一九八六年起五年間輸入六百萬噸鋼鐵製品，總價二億美元。⑩一九八六年三月卅一日，「塔斯社」發表一九八五年蘇聯對外貿易總額三七八億盧布（上年四〇九億盧布），輸出一八六億盧布，輸入一九二億盧布，是三年來第一次入超。⑪蘇聯首次公布其通貨膨脹率，自一九七〇至八六年，平均每年為百分之零點五，但西方認為應為百分之三左右。

⑫蘇聯現有外債約二〇〇億美元。

八十年代蘇聯經濟一般情況，可參閱附表。

蘇聯經濟成長鈍化的主要原因，計有：
 (一)軍費負擔增大；(二)農業不振；(三)勞動力不足；(四)資源開發漸向北、向東移，成本過高；(五)經濟基礎設備落後；(六)技術進步停滯；(七)計劃管理體制僵化、缺乏效率等等。這些因素並不是從事改革就容易克服的。然而不改革，蘇聯的經濟就可能於九十年代中期崩潰。

蘇聯的經濟改革不自今日始，但戈巴契夫政權似乎是以政治生命為賭注來從事改革。改革的總目標、總方向，是從勞力密集到資本密集，從面的擴充到質的提高，從粗放經營到集約經營，藉助高科技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產品質量和節約能源。

改革的內容項目繁多，主要原則在：(一)

附表一 八十年代蘇聯經濟的推移（%較上年增長 ▲減少）

項目	81年 實績	84年 實績	85年		81—85年		86年 計劃
			計劃	實績	計劃	實績	
國民所得	3.2	2.6	3.5	3.5	18	16	3.8
工礦業總生產量	3.4	4.2	3.9	3.9	26	20	4.3
生產資料	3.3	4.1	3.9	—	25.5	—	—
消費資料	3.6	4.3	4.0	—	26.2	—	4.9
農業總生產量	▲2.0	0.0	6.7	1.55	13※	8.7	4.4
勞動生產率（工業）	2.7	3.8	3.7	3.7	23	17	4.1
個人平均國民所得	3.3	3.0	3.3	—	16.5	—	2.5

（註）數字根據真理報、蘇聯國民統計集。一未發表 ※年平均
 資料來源：日本：日本經濟新聞，1985,11,27,第七面。

附表二 蘇聯與中共的五年計劃（%年平均增長率）

蘇聯 第十二個五年計劃 (1986~90年)		中 共 第七個五年計劃 (1986~90年)	
支出國民所得	4.1	國民總生產	7.5
工業總生產	4.6	工農業總生產額	6.7
生產資料	4.4	工礦業總生產額	7.5
消費資料	4.9	輕工業	7.5
勞動生產率（工業）	4.6	重工業	7.5
農業總生產	2.7	農業總生產額	4.0
個人平均實質所得	2.7	基本建設投資總額	—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1987,1,1,第十七面。

註⑩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五年四月廿七日，第六面。
 註⑪ 轉自讀賣新聞（日本），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第二面。
 註⑫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第七面。

改正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制度，計劃不全由中央製頒，可由企業擬訂後彙報上級；(二)資源分配不由中央掌握，使資材、原料供應市場化；(三)確立企業自主財政，即建立獨立核算制；(四)在價格制度方面，使企業有權決定與需要相連結的價格。^⑭

戈巴契夫的改革，根據上述總方向，採取下述重點：強調採取高級技術，現有舊機器三分之二不再修理，全力更換企業設備，以機器製造業、電子自動儀器業為核心，推動國民經濟全面發展。放棄過去依靠興建新廠、擴大基建那種浪費的方式，採取集約經營，就是不從事面的擴張而要求質的提高。以銀行貸款代替以前的無償撥款，建立企業獨立核算制，鼓勵其自負盈虧。下放權力，使企業能自立地自行安排生產。撤換不願改革和缺乏管理能力的幹部。實行對外開放。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就是採用高科技，全力投資、全速發展的野心計劃，新計劃的折舊率大為加速，即縮短設備使用年限，註銷的舊機器總值二、四〇〇億盧布。

在機構改革方面，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物質—技術委員會、國家科學和技術委員會三者將進行機構改革（尚未實行），將其一部分權力下放到地方機關或企業。若干部及經濟機構將進行統合。在獨立核算制方面，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經政治局會議決定，自一九八七年起，化學與石油工業機械完全採用獨立核算制，其他工業關係部的企業與聯合企業，亦將陸續採用獨立核算制。集體農莊也採獨立核算制。生活資料（消費財）生產、服務業、住宅建設等部門，也將擴大地方權限。

一九八七年二月廿四日，戈巴契夫對一位西歐領導人說，蘇聯「將堅定不移地，但也要小心謹慎地前進，以便保持船不搖晃，使任何一個船員和乘客都不會暈船。」^⑮如此看來，戈巴契夫的改革是膽大心細的，是小心謹慎地勇往直前。一九八四年已開始經營管理方式和加強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工作，一九八五年就擴及到七〇〇項企業，一九八七年要擴大到全部工業及運輸產業部門。又，一九八七年起，約有廿個部門的七十個企業，可以直接對外貿易。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最高蘇維埃會議通過，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起實施「個人勞動法」，將部分製造業、服務業開放給個人經營。在蘇聯官僚主義營運下的公有經濟，常常使人民感到貨品供應不足，買東西要大排長龍，於是所謂「第二經濟」的地下工廠就應運而生。這些地下企業家，可從黑市買進原料與機器，雇用黑市工人從事短時間的非常勞動（報酬常為國營企業工資之五至七倍），生產衣服、鞋子、家庭用品、布料、斜紋布、皮革製衣類、電氣製品等。蘇聯各地似乎存在著地下私營汽車修理廠，他們神通廣大，有時可調用鐵路車輛、租用飛機從事運輸。服務行業方面，也早就存在著巨大的地下私營汽車修理廠。^⑯現今准許私營，有些也只是化暗為明而已。不過，蘇聯把它最落後且為人民所不滿的修理業（汽車、皮鞋等）、計程車、牙科醫師、食堂、

註⑭ 參閱「已發動的蘇聯第二次革命」(3)，讀實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第五頁。

註⑮ 于虛，「蘇聯改革的新發展」(下)，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第二版。

註⑯ 讀實新聞(日本)，一九八三年八月卅一日，第四頁。

設計師、洋裁店等廿九種行業開放給個人，儘管勞動者有所限制且抽取稅金^⑭，但一開始在莫斯科就有兩萬人申請，獲准者九千人。蘇聯當局預期全國參加個人勞動者可能當總人口百分之一（一般人估計可達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即二至三百萬人，年間稅收可達五〇至六〇億盧布。^⑮

一九八七年六月的最高蘇維埃會議，預定將通過「國家企業法」，目的在擴大企業自主權，包括獨立核算制，對資金調配、工資等級的自主裁量權等。

蘇聯國營企業已有破產的事例出現。又拉脫維亞共和國里加一家有從業員四千人的汽車公司則公開招聘經理。^⑯一九八七年初起，蘇聯也與外商合辦企業，着眼在產品外銷以賺取外匯或代替輸入以節省外匯，更希望引進高科技產品，現由美、日、西歐先進國家提出的申請案件超過二〇〇件（已核准一二件）。^⑰

三

沒有政治改革並行，經濟改革是難以成功的，因此戈巴契夫也鼓吹政治民主化。他說：「（一九八七年）一月全會的主要思想就是發展民主」。「民主的實質就是勞動者掌權」。他認為，「只有通過民主和借助民主，改革才有可能實現」；不擴大民主和推進民主，改革就會「受挫」「夭折」。他提出了一個在經濟、政治和黨內全面發展民主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其主要內容是：

（一）完善選舉制。從聯合企業的廠長、經理到工段長，從基層黨委到州委、市委和加盟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以及各級蘇維埃代表，都由選舉產生，實行多名候選人競選（過去一張票一個候選人），不記名投票。非黨人士也可以擔任領導工作。

（二）完善監督制。不僅要加強「上面」的監督，還特別要加強來自「下面」的監督。被選舉和被任命的人，要按照公開原則，定期向勞動集體和選民匯報工作，聽取批評意見。要提高選舉產生的機構的作用，使它們能對執行機關進行有效的監督。要發揮

註⑭ 個人經營參加者限靠退休金生活者，身體障害者、學生、主婦以及不妨害本業的業餘勞動者。個人經營的收入，年間免稅額八四〇盧布，三、〇〇〇盧布以下抽百分之二三，以上抽百分之二〇至六五，採累進稅率。計程車每年繳稅五六〇盧布，修理業三四〇至四七〇盧布。

註⑮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第六面。

註⑯ 朝日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第三面。

註⑰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五月十日，第五面。

輿論工具在這方面的作用。^②

戈巴契夫釋放了不少政治犯，物理學家沙哈洛夫（Andrei Sakharov）已返回莫斯科，他被允許參加國際會議，並曾與訪蘇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晤談。托洛茨基（Lev D. Trotsky 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在某個歷史劇中被再評價。^③ 布哈林（Nikolay I. Bukharin 一八八八—一九三三）夫人正等著為丈夫恢復名譽。巴斯特納克（Boris L. Pasternak 一八九〇—一九六〇）也恢復了名譽，他被蘇聯作家聯盟除名的處分已經取消，他的著作包括被禁的齊瓦哥醫生（Dr. Zhivago）在內的全集即將問世。^④ 蘇聯文藝界有第二次「解凍」現象。報章雜誌的報導，已突破了若干禁區，出版檢查制度也有可能廢止。不過，戈巴契夫雖然注意到資訊公開並要求發揮輿論工具的監督作用，但他也強調報紙批評的「真實性和建設性」、「不能背離社會主義」，「不要把一切都算在黨委的帳上」^⑤。

戈巴契夫的改革，除了對內整頓黨政組織，恢復共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與權威，改革經濟體制，突破僵化、停滯的困境外，對外還要增加外交活力，改善在國際間的孤立地位。

對西方外交，戈巴契夫常採取主動並爭取宣傳優勢，表現出不少讓步姿態，但仍堅守共黨外交原則——不做賠本生意。例如在限核、裁核談判中，接受實地查證，不將英法核武併入談判及接受美國的「零方案」等等就是讓步姿態。可是，蘇聯撤除歐洲的SS20等中程長距離飛彈，在亞洲保留一〇〇枚，使日本和中共不悅，蘇聯可藉此分化它們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核武完全撤出歐洲，西歐無法對抗華沙公約絕對優勢的傳統軍力。「零方案」實現後，蘇聯將很容易在歐洲重行部署中程飛彈，美國飛彈重返西歐可就極端困難了。西歐也會懷疑，一旦東西歐戰爭爆發，美國會不會為了保護西歐盟國而動用它本土的核武器，這又會增大美國和西歐之間的離心力。更重要的是蘇聯會始終掌握著優勢軍力。當然，在優勢中達成限核協議，也適合蘇聯解決國內經濟困難的需要。

重新謀求鞏固共黨陣營的團結，是戈巴契夫努力的重要目標之一。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七年四月十日在捷京布拉格演說，他首先說明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期已經過去，目前已到達一個新的階段，要求兄弟國家的黨、國家、社會合作的整個體制提升到新的水平，在平等、彼此負責的基礎上，任何國家也無權強求在社會主義世界佔特殊地位，每個黨獨立地對它本國人民負責，有權自己決定本國發展的問題。同時他又強調社會主義大家庭每個黨和國家，不僅關心自己的利益，而且也關心共同的利益，如果

註① 引自于虛，「蘇聯改革的新發展」（上），文滙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一日，第三版。

註② 讀實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三月廿二日。

註③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一九八七年二月廿日夕刊，第三面。

註④ 「蘇聯改革的新發展」（上）。

不尊重朋友和同盟者，不考慮他們的利益，就不能取得成就。他說，大家一致認為，在經濟方面一定要遵守互利互助的原則，使國民勞動產品的實際交換，構成「一體化」的自然基礎。與此同時，我們社會制度的國際主義本性，要求援助不夠發達的國家，以便使他們能夠充分的參加社會主義分工，最終拉平經濟水平。他又強調，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是為了解決一些極其重要的問題，如安全、防止核戰爭、為人民的和平勞動保障正常的外部條件等等。

戈巴契夫強調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發展的現階段，其重要特點之一，就是交換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總結這些經驗的意義跟著提高。他說，由於歷史的安排，在社會主義體系形成的最初階段，唯有蘇聯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所以這些經驗當然會被視為是標準的，而現在一系列兄弟國家已經具有豐富的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在整個歷史過程中，他們運用了獨特的形式和方法。任何黨也不能壟斷真理。他們當然都非常希望考慮到本國條件，來利用在社會主義世界裏出現的一切寶貴的經驗。我們可以說現在制訂執政的共產黨嚴肅態度的可靠準繩，不僅是它對自己的經驗所持的態度，而且還有它對朋友們的經驗所持的態度。至於如何評價這些經驗的價值，我們的標準是，其社會政治實踐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如何，以及它在實際上是否能鞏固社會主義。^②

在亞洲，蘇共已唆使蒙共邀請亞太地區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於一九八七年中在烏蘭巴特舉行「協商會晤」，這當然是為了團結亞太地區的共黨。中共已表示它不參加「會晤」，理由是舉行這種「會晤」的條件尚未成熟。那麼，條件成熟後，它還是會參加的，它已為自己預留了後步。外蒙在蘇聯心目中的地位，似乎已較前提高，它已與中共改善關係並簽訂領事條約，和美國建交，這些連同上述共黨會晤在烏蘭巴特舉行，都出自蘇聯的授意，烏蘭巴特可能成為蘇共團結亞太共黨的據點。一九八六年一月，蘇聯外長謝瓦納澤（E. A. Shevardnadze）。於訪問日本之後，繼之訪問平壤和烏蘭巴特。同年起，東歐國家的黨政領導人正式或非正式訪問中共，其路線大都是平壤——北平——烏蘭巴特——莫斯科。蘇聯與北韓、越、柬加緊了軍事及政經關係，金日成於一九八七年五月訪問中國大陸，寮國已與中共改善關係，越南也不時表示一些同中共「和」的姿態，而蘇聯與中共的實質關係，正迅速增進中。這些共黨政權，彼此間還充滿矛盾、困難，但上述種種動態，却不能不引人注目。

蘇聯要在太平洋時代，成為亞太地區的超強，這在一九八六年七月廿八日戈巴契夫的海參崴演說中，表現得十分清楚。除了企圖重新團結亞太共黨外，蘇聯外交部有關亞太事務的機構已大加調整，廢除了原有的第一、第二遠東司和東南亞司，成立：（一）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局，主管中共、北韓、外蒙、越、柬、寮事務；（二）太平洋司，主管日本、澳洲、紐西蘭及若干太平洋島國家事務；（三）東協司，主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汶萊等國事務。蘇聯勢力已伸入南太平洋，它在亞太地區的軍力正在增強，謝瓦納澤於一九八七年三月訪問了泰國、澳洲、印尼、寮、越、柬六國。蘇聯已先後列席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一九

註② 莫新科電臺評論與談話，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一日。

八六年十一月)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年會(一九八七年四月)。它又重提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及亞洲會議，戈巴契夫曾與印度簽署「新德里宣言」(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鼓吹建立無核、無暴力的世界，蘇聯又簽署了南太非核條約(同年十二月十五日)，並建議同日本發表「東京宣言」(尚未實現)，鼓吹緩和遠東地區的緊張。當然，我們並不認為蘇聯的亞太攻勢會一帆風順，但它的最近動向却不應忽視。

至於蘇聯同中共的關係，除了經貿、文化等方面的進展外，戈巴契夫已允自外蒙、阿富汗部分撤軍，並願在中蘇邊界河流依中航道劃界，那是明顯地以讓步姿態與中共緩和關係。中共則竭力淡化它同蘇聯政治關係的改善，前傳一九八七年五月李鵬訪蘇並未實現，而是「副總理」姚依林率團於同月十一日赴蘇，與蘇聯第一副總理塔里津(N. B. Talysin)舉行「中蘇經濟、貿易、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中共對此又故意不多事報導，可是這就更令人懷疑北平和莫斯科可能有暗盤交易。

中共和蘇聯之間存在著矛盾，不會恢復五十年代的親密關係，那是無可否認的。然而，蘇聯要成為亞太超級大國，豈能與中共長期對立？中共與蘇聯毗鄰而居，有七千五百餘公里的陸界，倘若依靠西方與蘇聯敵對，一旦有事，遠水救得了近火嗎？共黨政權最會考慮現實利害，我們同樣不能否認。

四

戈巴契夫大刀濶斧地調整機構、撤換幹部、整飭紀律，可是他的政權已絕對鞏固了嗎？那就不敢說了。據美國研究蘇聯問題專家的看法，戈巴契夫過去兩年來所推動的黨政改革，已引起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反對，這種情勢的演變，甚至也導致當前蘇聯政局成為二十年來最不穩的時期。這種看法認為，政治局中有三大派，戈派僅係其中之一。中央委員會內有五個反戈團體，並且指出第二號人物李加契夫(E. K. Legachev)就是最大的反對者。②這種說法，也不可盡信。但反對者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改革一旦遇到挫折，反對者就可能乘機挺身而出了。

戈巴契夫已經承認蘇聯的改革比原來預料的更困難。③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布拉格演說中談到共黨國家的停滯現象和科技落後時說，這不能怪社會主義制度，雖然我們的思想敵人是這樣說的。他認為問題在於領導國家管理工作中的錯誤。雖然他仍然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而只改進國家管理工作，但他的做法必被教條主義者認為離經叛道而加以反對。在布里茲涅夫統治下的蘇聯

註② 江偉碩，「戈巴契夫的心腹大患」，中央日報(臺北)，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八日，第五版。

註③ 「蘇聯改革的新發展」(下)。

，形成一個僵化刻板的體制，特權階層只會保護自己的利益。黨及官僚不獨不是領導社會前進的原動力，反而成爲阻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②體制改革就涉及到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把上級的權力下放到地方和企業，原來掌權者就被削了權，跟著也就失去了既得利益，他們能不反對？企業的廠長、經理，原本是依上級計劃行事的官僚而非企業家，改革後他們有了部分權力，但同時要自負盈虧，那副外行人不容易擔得起的擔子是沉重的，他們也未必都心甘情願。一般工人或許有些會得到工資差距拉大的好處，但企業負責有了人事任免權後，他考慮到不讓企業虧本，難免有獎懲甚至裁員的舉措，於是「鐵飯碗」、「大鍋飯」就都不存在了，工人們可未必高興。由於引進市場機能，改革價格制度，物價難免波動，使一般收入並未增加的人民，未見改革之利，先受改革之害，也是必然會有的現象。

誠如香港文匯報所說：「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裏，構成改革的最大阻力，竟然來自執政黨本身，實在是社會主義政制的一大特色，同時也是對有先鋒黨之稱的共產黨的一大諷刺。」③又說，「社會主義國家，問題積重難返。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說過，蘇聯這樣的社會，不能擺脫兩種危機：如果不改革整個體制，經濟危機就會出現；但若展開任何改革方案，却會帶來政治危機。證諸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情況的確是這樣。」④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立起來的、以公有制爲主導的經濟體制，不可能完全放棄由上而下的計劃制度，以及由中央掌握的原料供應或資源分配制度，因而改革也就很難有成功的希望。戈巴契夫在拉脫維亞說要苦幹二、三年，可是現今國內就有反對者，甚至東歐各國也怕受到影響而感覺疑慮。

戈巴契夫政權的前途並非康莊大道，其改革的成敗，不僅關係他個人的前途，恐將影響到共黨集團乃至整個世界。

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廿五日脫稿

註② 田慧，「蘇聯改革的曙光」(中)，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二月廿八日，第十五版。

註③ 「蘇聯改革的曙光」(下)，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第十五版。

註④ 同註③。